

“中拉关系60年：回顾与思考”研讨会综述

· 王俊生

2009年8月29~30日，“中拉关系60年：回顾与思考”研讨会在外交部张湾培训基地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外交部拉美司、中联部拉美局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承办。会议聚焦中拉关系的成就与展望，围绕四个主题进行了研讨：中拉关系的总结与思考、中拉政治关系、中拉经贸关系、中拉文化交往。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词。第九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拉友好协会会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名誉会长成思危，文化部部长蔡武，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特别顾问、外交部副部长李金章，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特别顾问、中联部副部长陈凤翔，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会长苗耕书等与会并作了主旨演讲。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50多篇，参会代表超过130人，分别来自外交部、中联部、文化部、商务部、对外友协等部门，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科研和教学单位，以及《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一批长期从事对拉美外交工作的老大使应邀与会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亮点。在两天的会议中，通过主旨演讲、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小组汇报等不同形式，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中拉关系60年发展的回顾

这次研讨会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召开的。总结中拉关系60年的发展是本次研讨会讨论的焦点之一。对此，成思危副委员长用“积跬步、致千里”概括中拉关系60年的历程。他指出，经过半个世纪的积累与沉淀，中拉关系在新世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王伟光常务副院长着重论述了中拉关系由稳步推进走向全面发展的特点。蔡武部长介绍了中拉文化交流的拓展与成就。

李金章副部长对中拉关系60年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回顾。陈凤翔副部长分析了中拉党际关系不平凡发展历程。苗耕书会长则从经贸往来与拉美企业合作的角度回顾了中拉关系60年的发展。

王伟光常务副院长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关系经历了一个不断积累和逐渐成熟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中拉政治关系出现重大突破，继中国和智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拉美地区掀起了与中国建交的小高潮，中拉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拉双方实现高层互访，政治关系继续稳步推进。进入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中拉高层交往频繁，政治互信增强，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明显增多，在国际机构中的相互协调与配合不断加强。目前，中国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智利等拉美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或“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并不断充实其内涵。中拉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中国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20国集团、“金砖四国”、“G8+5”框架内的沟通和协调越来越频繁，在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黄志良大使将中拉关系的60年划分为四个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20年间是以民间交往为主的“民间外交”时期；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同拉美大多数国家实现建交、中拉关系进入迅速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是中拉各领域友好合作取得长足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是中拉关系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迅猛发展的崭新时期。

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则将中拉关系60年的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民间交往（1949~1969年）、建交高潮（1970~1977年）、平等互利与共同发展（1978~1992年）、建立长期稳定关系（1993~2000年）和“跨越式”发展（进入21世纪后）。在此基础上，郑秉文所长得出中拉关系60年的发展属于“累积—跨越式”的学理总结。对

于“累积—跨越式”发展临界点的突破，他认为主要得益于中拉关系于21世纪初迎来了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

在以上回顾的基础上，蔡武部长、苗耕书会长等均认为目前中拉关系的发展无论是速度、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拉美战略地位与中拉关系发展的机遇

如何评估拉美地区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中拉关系发展的机遇，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个重点。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新华社高级记者沈安指出：第一，拉美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消费和投资市场。第二，拉美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已成为世界主要能源、原料和粮食供应地。第三，大多数拉美国家进入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各国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形态趋向多样化。第四，拉美独立外交和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美拉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他还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战略利益：在政治上，拉美国家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战略的合作伙伴。在经济上，拉美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贸易和投资市场，是某些重要资源的来源地，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在文化方面，中拉之间的广泛交流对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加强中国软实力外交也具有重要意义。

部分学者还就巴西的国际地位问题发表见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研究中心主任牛海彬认为，目前巴西的“大国梦”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佳的实现机遇，其大国地位在既有的资源禀赋和大国意识基础上，正在得到国家实力、国际战略和全球议题的全面支持。具体来说，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巴西政府通过负责的经济政策建立了较好的国内经济基础，国内政治较为稳定，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提供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公共产品，树立起巴西作为新兴大国的积极形象。而国内政策成功所构建的大市场又反过来为巴西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影响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这些都为巴西在国际社会的许多领域发挥作用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比如巴西已经成为世界贸易、气候变化和国际发展等议题中的重要全球利益攸关方。

陈笃庆大使建议，应重视对巴西国内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看到其国内外取得的成绩，也应注意其国内所存在的问题，如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同时巴西有“重内政、轻外交”

的传统——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一一直舍不得财政上的高投入，这些无疑都会制约巴西今后的发展。

原焘、黄士康、黄志良、王珍、朱祥忠、徐贻聪、王永占、沈允敖、李连甫等曾长期在拉美工作过的大使，也对目前拉美有关国家的相关情况以及如何如何进行相关的国别评估发表了见解。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会长苏振兴从学理的角度同样认为当前中拉关系的发展正处在重要的机遇期。他指出，这个机遇期由四种因素构成：第一，新兴市场国家地位上升，相互合作加强；第二，拉美国家作为中国合作伙伴的重要性提高；第三，拉美国家把中国崛起视为重要的发展机遇；第四，拉美的外交“多元化”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郑秉文所长在讲述中拉关系发展的“累积—跨越式”特点时也对当前的中拉关系作出了评估：第一，向战略高度跨越；第二，向平衡的地缘格局跨越；第三，向全方位合作跨越；第四，向多样化的经贸合作方式跨越；第五，向双边关系机制化建设跨越；第六，向加强国际多边合作跨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吴洪英就中国和拉美的改革开放进程对双边关系发展的影响作了评估：第一，改革开放成为中拉双边关系快速发展的新背景和新前提，当前处于最佳历史时期的中拉关系正是两国30年来社会经济必然产物；第二，改革开放为中拉双边关系的不断发展与深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源；第三，改革开放为中拉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确立了基本方向。

中拉关系发展中的相关因素

许多学者认为，过去60年中拉关系的发展一直受到一些相关因素的影响，这种情况今后也不可避免。苏振兴会长指出，中拉关系的发展受到五个主要因素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这五个因素是：国力因素、地理因素、美国因素、台湾因素和文化因素。黄志良大使则强调了四个因素：美国因素、台湾因素、经济因素和民间外交。

陈凤翔副部长从政党外交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拉关系发展中的政治因素。蔡武部长认为文化因素对于推动中拉关系的发展十分重要。苏振兴会长指出，鉴于中拉之间地理上相距遥远和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因此，人文交流在双边关系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关于如何加强人文交流，他指出：第一，在中拉人文交流中有必要确定一些重点领域，如教育

合作,人文学术交流,民间团体交往,等等,以求用相对有限的资源去获取更大的交流效益;第二,大力改进各种宣传媒介;第三,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第四,要重视吸收拉美优秀文明成果。

郑秉文所长详细论述了中拉关系中的经济因素,认为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利益主要有:第一,拉美是中国工业原料的重要供应地;第二,拉美是中国能源来源地多元化的现实选择;第三,拉美是中国企业布局海外的战略性支点。而拉美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则有:第一,中国是拉美的“贸易天使”;第二,中国是拉美基础设施建设的“外援”。

对于中拉双方的经贸合作,苗耕书会长认为双方互补性强,前景广阔;第一,中拉双边贸易规模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二,中拉投资合作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三,中拉金融合作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沈安在对比拉美国家对中国期待的各个层面时指出,相对于政治期待,拉美更希望通过经济贸易合作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发展本国经济。

进一步发展中拉关系的思考

对于如何进一步发展中拉关系,各位学者也纷纷献计献策。苏振兴会长指出,60年来中拉关系的发展可以得出一条重要的经验:中拉关系的稳步发展既有赖于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也有赖于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去有效地发挥国力因素的积极作用和化解各种不利因素的消极影响,而这也就可以指导未来中拉关系的建设。

郑秉文所长认为,从战略高度考量中拉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已刻不容缓,这也是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提出的要“切实维护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发展利益”的重要体现。他强调指出,目前来看,“发展利益”正上升为中拉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对中国来说,拉美是其工业原料的重要供应地,并逐渐成为我国能源来源地多元化的现实选择和我国企业布局海外的战略性支点。对拉美来讲,他们始终在对华关系中以追求经贸合作的实际利益为重点,并把中国看作对外经贸关系多元化的战略选择。所以,“发展利益”完全符合中拉双方的发展逻辑,是中拉双方共同追求的战略核心和实现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中拉双方核心利益的这一“重心”,既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也符合广大拉美国家的“发展利益”。由此可见,为“发展利益”服务也就自然成为中拉双方的一个共

同诉求。中拉关系面临的这种微妙变化与转型既是中国和拉美双方自身发展的潜在需求和必然结果,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客观使然和必然趋势。

沈安认为,中国应抓住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在通盘制定和实施对拉美地区的战略和政策时应关注以下问题:提高中拉之间高层合作的档次和形式;加强和扩大对拉美地区多边组织的参与及合作;加强与拉美地区大国的战略合作;加快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与更多的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继续大力推行“走出去”战略,在全球投资战略的框架内,制定和实施对拉美投资和贸易战略;加强和扩大与拉美国家的金融合作;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协调在拉美事务方面的政策;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统一实施和协调对拉美战略及政策;以新思路看待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拉丁美洲研究:任重而道远

发展中拉关系,人才是关键。许多学者均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中拉关系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与拉美研究的相对滞后形成了鲜明对比。

苏振兴会长指出,我国一些企业家到拉美考察谈判甚至找不到既了解拉美当地情况、又能流利使用当地语言(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助手。

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韩琦指出,我国的拉美史学科建设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中拉关系新形势的要求。关于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韩琦认为主要有两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导致许多人不愿意研究相对较偏的拉美史和教育部门在专业管理体制上对世界史学科整体不够重视。他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建议国家主管部门重新科学地审视包括拉美史在内的世界史各分支学科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并对拉美史这一年轻的分支学科建设与发展予以必要的扶持。第二,建议从事拉美史研究的同仁要坚定信心,充分估计和把握住近年来新一轮调整专业目录工作所带来的新机遇,胸怀全局、立足本职,促使本单位积极作好拉美史学科自身的基础性建设工作。第三,建议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开展与拉美国家同行的学术交流。

与会代表普遍感到,我国的拉美研究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应当抓住机遇、趁势而上,把我国拉美研究与学科建设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为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